

《淡江中文學報》
第十八期 頁225~252
淡江大學中文系 2008年6月

「抒情傳統論」以前 ——陳世驥早期文學論初探

陳國球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提 要

陳世驥（1912-1971）以〈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為現代的中國文學研究標示了一個重要方向，影響深遠。然而，他的早期文學思想怎麼形成？其「抒情傳統論」緣何而生？學界罕有討論。本文考察陳世驥早年在北平大學攻讀，以至赴美國任教初期的文學活動；試圖從他的文學論述與當時的文學及文化政治之互動，探索其早期文學觀念的形塑過程，並留意這些早年論述與後來成型的「抒情傳統」論的關連。

關鍵詞：抒情傳統 陳世驥 艾克敦 朱光潛 陸機 《文賦》

「抒情傳統論」以前

——陳世驥早期文學論初探

陳國球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

一、前言

陳世驥（1912-1971）是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常常提到的名字，尤其他的〈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更是膾炙人口。在大陸以外的中國文學研究，或多或少都曾受這個論述傳統影響。然而，大家反覆徵引者不外是收錄於《陳世驥文存》中十篇論文，似乎沒有多少人留意陳世驥的學術道路；他對「抒情傳統」的認知過程如何？他的學術思維有甚麼時代和文化的基礎？也少見考論。本文作者有意以陳世驥的學術歷程為研究對象，希望通過這個研究，一方面可以進一步理解「抒情傳統」這一現代詮釋傳統的緣何而生？其詮釋能力與其生成過程有無關係？其未來發展的前途如何？另一方面，試圖透過一位經歷大時代變化的華裔學人的學術心路，了解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政治，從而思考現今學人在障礙更多的學術路途上，應如何開展步履，向前邁進。準此而言，本文離目標還很遙遠。本文只能充當這個研究計劃的預備工程之一。

陳世驥，字子龍，號石湘。河北人，1935年北京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畢業，留校任講師。抗日戰爭爆發後離開北平，在長沙湖南大學任教，1941年轉赴美國，在哈佛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從事教研工作，1945年受聘加州柏克萊大學，曾任該校東方語文

學系系主任，又籌辦比較文學課程。^❶他的著述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兼及中國當代文學以至翻譯研究，文章散見各學刊或論文合集。其中十篇中文著作和譯文由弟子楊牧（王靖獻）編選入《陳世驥文存》；^❷大部分以英文寫成的論文還未結集，因而流通不廣。^❸

-
- ❶ 有關陳世驥生平概況，可參考商禽：〈六松山莊訪陳世驥教授問中國文學〉，《從真摯出發》（台中：普天出版社，1971年），頁1-18；史誠之：〈桃李成蹊南山皓——悼陳世驥教授〉，《明報月刊》，68期（1971年8月），頁14-22；謝朝樞：〈斷竹·續竹·飛土·逐穴——陳世驥教授談：詩經·海外·楚辭·台港文學〉，《明報月刊》，第68期（1971年8月），頁23-30；楊聯陞：〈追懷石湘——陳世驥選集序〉，《傳記文學》，第19卷第5期（1971年11月），頁18-19；夏志清：〈悼念陳世驥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傳記文學》，第19卷第5期（1971年11月），頁16-23〔修訂稿見《文學的前途》（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4年），頁211-229〕；楊牧：〈柏克萊——懷念陳世驥先生〉，《傳統的與現代的》（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頁218-232；Cyril Birch, "Obituary: Shih-Hsiang Chen, April 23rd, 1912-May 23rd, 1971,"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1.4 (October-December, 1971): 570-571; Charles Witke, "Chen Shih-Hsiang: In Memoriam," *Tamkang Review* 2.1 (1971): 1-2; Harold Acton, *Memoirs of an Aesthete* (London: Methuen, 1948)。陳子善曾指出陳世驥於1932年在北大畢業，1947年開始任教加州柏克萊大學，見陳子善為簡體字版《陳世驥文存》（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寫的〈本書說明〉。本文提到陳世驥的畢業年份主要根據白之（Cyril Birch）所撰訃文，並參考艾克敦的《唯美者回憶錄》（*Memoirs of an Aesthete*）。
- ❷ 陳世驥：《陳世驥文存》（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收入中文論文8篇，英譯中論文2篇；簡體字本由陳子善校訂，增收中文2篇，英譯中1篇，於1998年出版。
- ❸ 楊牧在《陳世驥文存》的〈編輯報告〉曾說明陳世驥的英文著作「委由加州大學Cyril Birch教授編輯」（頁268）；又參楊牧：〈柏克萊——懷念陳世驥先生〉，《傳統的與現代的》（同前註），頁230。至今白之（Cyril Birch）已從加州大學退休，此一英文專集仍未面世；大概這個計劃不會實現。陳氏的中英文著作目錄見Alvin P. Cohen, "Bibliography of Chen Shih-hsiang, 1912-1971, Part I: Writings in English,"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1 (Jan., 1981): 150-152; C. H. Wang and Joseph R. Allen, III, "Bibliography of Chen Shih-hsiang, 1912-1971, Part II: Writings in Chines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1 (Jan., 1981): 153-154。這兩個目錄其實並不完備，尤其1941年離開中國以前的著作均沒有記載。

二、陳世驤與現代文學

陳世驤的學術成就無疑是遠赴美國以後才漸漸顯現，但他去國以前的經歷，不僅是一位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學者的學思道路的起點，更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文學研究思潮如何在海外與台港發展或者變奏的一個樣本，值得我們注意。可惜相關的記載比較少；最常被提及的是他與英國詩人艾克敦（Harold Acton, 1904-1994）聯合英譯了第一個現代詩的選本——《中國現代詩選》（*Modern Chinese Poetry*）。^④事實上，陳世驤在北京大學讀書以至擔任講師期間，非常積極參與當時的文學活動。他的先後同學輩包括「漢園三友」：同系的卞之琳、李廣田和哲學系的何其芳；他自己也有小說、散文和詩歌的創作，但至今已不易見了。^⑤從現存資料可知，他是當時在北平慈慧殿 3 號朱光潛家中進行的「讀詩會」的常客，與會者包括北京大學的沈從文、梁宗岱、馮至、孫大雨、羅念生、周作人、葉公超、廢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清華大學的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華，以至林徽因、周煦良等等；^⑥1935 年 12 月 6 日《大公報·文藝》第 55 期還刊登了陳世驤寫給主編沈從文的信，題作〈對於詩刊的意見〉，由「讀詩會」的聚會談到大家關心的《詩特刊》問題，又表達了他的文學見解。^⑦

④ *Modern Chinese Poetry* (London: Duckworth, 1936).

⑤ 目前經眼的陳世驤創作，散文有〈北大外景速寫〉，載《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北京大學 1935 年 12 月版），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529-532；新詩有〈今日的詩〉，載上海出版的《新詩》，第 2 卷第 2 期（1937 年 5 月），頁 144-145。

⑥ 參考沈從文：〈談朗誦詩〉，《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年），第 17 卷，頁 247。沈從文這裏的記述是今人談到「慈慧殿」讀書會最常徵引的資料，當中沒提及陳世驤。但據以下提到陳世驤寫給沈從文的信，可見他是「讀詩會」的參與者之一。

⑦ 《詩特刊》之面世，是當時「讀書會」討論的結果。沈從文在他主編的《大公報·文藝》1935 年 11 月 10 日發表〈新詩的舊賬——並介紹詩刊〉，對此有所說明：「要有個要有個『好的將來』，必需要有個『目前』。目前新詩不妨說還是試驗中，可走的路甚多，從各方面都可努力。可是若沒有個試驗的場所，來發表創作，共同批評和討論，中國新詩運動不會憑空活潑起來，那個將來太渺茫了。所以我們預備在這個副刊上，從上期起出一個《詩刊》，每月預備發稿兩次，由孫大雨、梁宗岱、羅暉先生等集稿，作者中有朱佩弦、聞一多、俞平伯、朱孟實、廢名、林徽音、方令孺、陸志韋、

再考察陳世驤在北京大學所受的文學訓練，我們可以更好的理解其文學品味和思考方向的初貌。^⑧這裏先把焦點放在他的北大老師艾克敦身上。與陳世驤合譯《中國現代詩選》的艾克敦，是二十代開始在英國文壇崛起的牛津詩人；^⑨1932年任教於北京大學。他也常常參加北京的各種文學聚會，與溫源寧、朱光潛、梁宗岱等時相往來。從1933年7月開始，陳世驤就住在他家中，不久就開展了合作編選及英譯現代詩的工作。^⑩二人的翻譯陸續見載於曾為北大外文系主任溫源寧等主編，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以至美國詩人哈莉特·蒙羅（Harriet Monroe, 1860-1936）在芝加哥出版的重要詩刊《詩》（*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之上。^⑪

馮至、陳夢家、卞之琳、何其芳、李廣田、林庚、徐芳、陳世驤、孫毓棠、孫洵侯、曹葆華諸先生。這刊物篇幅雖不大，對中國新詩運動或許有點意義，因為這刊物的讀者，是本報分佈國內外十萬讀者。編者的希望，不在十萬讀者永遠成為少數作品的鑒賞者，卻想這刊物能引起多數讀者的注意，從國內外各處地方把詩寄來，把個人對於新詩的意見寫來，讓它慢慢成為中國讀者最多，作者也最多，同時還為多數人最關心認可的刊物。」據此，陳世驤是這個詩刊的特約作者之一。

⑧ 有關三十年代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創作和研究的關係，近時已有季劍青的全面整理和非常細緻深入的分析，此外張潔宇對同時北平的「前線詩人」研究，也為了解陳世驤周遭的文學環境提供了清晰描敘和析論。見季劍青：《大學視野中的新文學——1930年代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7年）；張潔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紀30年代北平「前線詩人」詩歌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⑨ 他自詡為「唯美者」（aesthete），在牛津大學讀書時已很受注目，曾在校園宴遊中高聲朗誦艾略特的《荒原》而為為人津津樂道；他的同群包括寫過《故園風雪後》（*Brideshead Revisited*）的伊扶林·沃（Evelyn Waugh, 1903-1966），以及伊迪芙·西脫惠爾（Edith Sitwell, 1887-1964）等。來中國以前，他已經出版過詩集 *Aquarium* (1923), *An Indian Ass* (1925), *Five Saints and an Appendix* (1927), *This Chaos* (1930). 有關他生平的記述，除了他兩本回憶錄：*Memoirs of an Aesthete* 以及 *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 (London: Methuen, 1970) 以外，還可參考 Edward Chany and Neil Ritchie eds., *Oxford, China, and Italy: Writings in Honour of Sir Harold Act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⑩ 據艾克敦回憶錄所記，陳世驤常常引領年輕的創作人如卞之琳等來暢談文學，英譯現代詩之議就是由卞之琳提出的；《唯美者回憶錄》還有一幀艾克敦與陳世驤、卞之琳、林庚、李廣田等的合照；見 *Memoirs of an Aesthete*, pp. 276; 336-337.

⑪ 《天下月刊》卷1刊載二人合譯聞一多、戴望舒、李廣田、卞之琳詩共7首；《詩》卷46刊載徐志摩、何其芳、林庚詩共7首。見 *T'ien Hsia Monthly* 1 (1935), pp. 70-71; 190; 303-315; 423-424; 495-507; 526-536; *Poetry: A Magazine of Verse* 46 (1935.4): 14-17.

艾克敦在北大初時開的課是「英國文學」、「莎士比亞悲劇」和「王政復辟時期喜劇」(Restoration Comedy)。第二年開始教現代英詩，他就堂而皇之的講授艾略特的《荒原》，以至勞倫斯的詩歌。陳世驥最少聽了他兩年的課。後來二人更日夕研討中國現代詩的英譯，據艾克敦回憶，他對現代中國文學的了解主要得自陳世驥。1935 年 11 月艾克敦在《天下月刊》發表〈現代中國文學的創新精神〉(“The Creative Spiri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這是早期以英文論述「新文學」的一篇相當有見地的論文，相信當中不乏陳世驥的意見。¹²

另一方面，陳世驥在討論翻譯的過程中，更熟習老師指導的文本細讀批評方法。他在《大公報·文藝》發表的〈對於詩刊的意見〉，與艾克敦的文章差不多同時完成。其中艾克敦的影響，也不難察覺。¹³陳世驥提出討論新詩「應該注意許多似乎細小而極基本的問題」，他建議：

凡是現代出過詩集對新詩有影響的詩人都分開討論一下，以他們的作品為主，範圍不怕狹，甚至只選一兩首他的代表作來批判，從小地方推敲，把他們所用的工具檢討一下，用具體的例証判斷他的情調、風格，成功與失敗，總比空泛地講些「內容」、「形式」、「藝術與人生」好些罷。¹⁴

文中他就以兩個具體例子說明他的觀點：一是卞之琳詩〈朋友和烟捲〉中間一段，另一是臧克家名篇〈老馬〉。卞之琳這首詩的英譯收入《中國現代詩選》，¹⁵但並沒有在後來結集的《十年詩草》或者《雕蟲紀歷》中出現。照陳世驥看來，這首詩顯示卞之琳之「善用語言的自然韻律(Speech rhythm)和分行、押韻的技巧」。他從字數參差安排與樂音抑揚的關聯、詩行造成的圖案及其寓意、韻腳音色的錯綜效應，發現了這幾行詩的「字音與節拍能那樣靈妙地顯示樂音的和諧與輕烟的迴旋節奏，絕不是率

¹² *Memoirs of an Aesthete*, p. 336; “The Creative Spiri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ien Hsia Monthly* 1.4 (1935.11): 374-387. 後者部分論詩的文字與《中國現代詩選》的導言相同。

¹³ 見下文註¹⁹引錄邵洵美〈新詩與「肌理」〉之說。

¹⁴ 〈對於詩刊的意見〉，《大公報·文藝》，第 55 期（1935 年 12 月 6 日）。

¹⁵ *Modern Chinese Poetry*, p. 131.

爾而成的」。用以對照的〈老馬〉一詩，在陳世驥細意分析之下，顯得「意念空泛」、「用韻粗笨」，雖然作者「有意識地以吟咏人世艱苦為己任」，但詩中的「情感狀態（Emotional attitude）完全現得虛偽」。陳世驥最重要的論點是：

詩人操著一種另外的語言，和平常語言不同。……我們都理想著有一種言語可以代表我們的靈魂上的感覺與情緒。詩人用的語言就該是我們理想的一種。那末我們對這種語言的要求絕不只是它在字典上的意義和表面上的音韻鏗鏘，而是它在音調、色彩、傳神、象形與所表現的構思絕對和諧。¹⁶

事實上我們可以把陳世驥這段話看作「詩言志」或者「詩緣情而綺靡」的一種現代詮釋：「我們的靈魂上的感覺與情緒」可以是指向內心世界的「志」或「情」的現代變奏，「音調、色彩、傳神、象形與所表現的構思絕對和諧」亦不外乎現代詩學意義下的「言」之「綺靡」。這篇文章所展示的文本細讀方式，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陳世驥後來在台灣發表的著名論文〈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後者以下的文字與上面的引文相近處非常明顯：

若只以為詩的文字之嫻熟只是字典和詩韻合璧的熟用，這雖然不差，但必然不夠。所以我們要進一步說，所謂形式form，決不只是外形的韻腳句數，而是指詩裏的一切意象，音調和其他各部相關，繁複配合而成的一種有機結構。¹⁷

這篇 1958 年的文章後來成為台灣以至海外文學批評的典範論文，影響深遠。¹⁸〈對於詩刊的意見〉以為詩的理想是「音調、色彩、傳神、象形」與詩人的「構思」達至「絕對和諧」；這「和諧」也就是〈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所講的「一種有機結構」的表現，也是陳世驥文學思想中的理想的「秩序」。前後二文對照，可以見到陳世驥的批評觀念的淵源和發展。

¹⁶ 同註¹⁴。

¹⁷ 陳世驥：〈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文學雜誌》，第4卷第4期（1958年6月），頁6。

¹⁸ 參考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臺灣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6年2月），頁12-13。

陳世驤〈對於詩刊的意見〉一文很快就得到邵洵美為文響應。他在 1935 年 12 月 21 日《人言周刊》發表〈新詩與「肌理」〉，指出陳世驤的意見近乎英國女詩人西脫惠爾的主張，¹⁹而西脫惠爾最重視詩的肌理（texture），以為「字眼的音調形式，句段的長短分合，與詩的內容意義的表現及點化上，有密切之關係」。²⁰邵洵美又運用這種「肌理說」來深入探討李白的《將進酒》的開篇三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這氣勢的浩大，正像泛濫的狂濤在天心直滾下來。第一個「君」字是那樣的清脆與響亮，大有雲開見日的意象，使你有仰頭高盼的感覺：點示著後兩句的距離與接近。後面十四字，除了「之」字外，沒有一個不是表現著波濤汹涌的聲音，一瀉萬里的境界；而最後那「回」字的悠長暗淡，十足給你一種越流越遠，「不復回」的意象。像這樣的絕妙佳句，怎不叫讀者擊節嘆賞，悠然神往呢？

邵洵美的點評比較著重欣賞感受，沒有陳世驤文所展示的拆解以作細部分析、再貫串綜論，那麼具體入微；但邵洵美在此只是解釋他心中要寫的《李太白評傳》的一些想法，以呼應陳世驤的文章，沒有完整的論析，不足為病。文章的結尾說：

陳世驤先生能在這時候提醒我們，實在是新詩的幸運；希望他多寫這一類的文

¹⁹ 邵洵美說：「他既然與阿格頓〔按：即艾克敦〕先生有著朝夕切磋的機會，對於現代英美的詩歌當然也有相當的認識。那封信上一切的意見，無疑地是受了英女詩人西脫惠爾（Edith Sitwell）的提示的。」見《洵美文存》（瀋陽：遼陽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134。西脫惠爾是艾克敦在文學上的摯友，邵洵美的觀察非常敏銳。

²⁰ 邵洵美又指出：「這 Texture 一字，曾由錢鍾書先生譯為肌理。」見〈新詩與「肌理」〉（同前註），頁 134。錢鍾書之說見於他就溫源寧《不夠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 1935）一書所撰書評，文中指出「肌理」：「是翁覃谿論詩的名詞，把它來譯 Edith Sitwell 所謂 texture，沒有更好的成語了。」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頁 336。翁方綱的「肌理說」是清代詩學繼「格調說」、「神韻說」、「性靈說」而後出現的一個重要主張；於此我們見到錢鍾書和邵洵美匯通中西詩學的用心。

章，新詩前途的光明可以預卜！。²¹

邵洵美關心的是「新詩前途」，但解說時借助西洋的學理，範例卻是古典詩句；這種「現代」、「西方」、「古典」的結合方式，是當時詩學思潮中不可忽視的傾向。

邵洵美注意到陳世驥〈對於詩刊的意見〉一文的理論資源，可能從艾克敦而來；事實上，陳世驥文中稱揚卞之琳〈朋友和烟捲〉的一些論點，也見於艾克敦的回憶錄。艾克敦也以這首詩來說明卞之琳的風格——「直捷、韻律自然、善用日常語言」；²²其關注點甚至批評詞彙，明顯與陳世驥之文相似，看來這是兩人的共同見解。

此外，艾克敦的現代中國文學觀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面：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傳統的關係。他為《中國現代詩選》撰寫的〈導言〉以及在《天下月刊》發表的〈現代中國文學的創新精神〉兩篇文章，其主要內容就是從文學史的角度析述新文學的發展，並對各階段的作家作出毫不含糊的評價，又在適當時候作出中西文學的異同對照。從中我們可以見到他對中國文學傳統的觀察。比如說，他以為中國詩歌的特點在於「興發與含蓄」（evocation and suggestion），覺得法國象徵派詩人魏爾崙（Paul Verlaine, 1844-1869）所追求的「不著色彩，只存濃淡」（“Pas de couleur, rien que la nuance”），其實更像是中國的美學原則。²³他又說中國詩歌雖多常見熟辭滑調，但卻可輻湊成強烈的印象，英詩中只有少數「意象派」詩人才能臻此境界。他又認為何其芳詩擅於運用古典辭藻，有如濟慈借用史賓塞（Spenser）之辭。更重要的是艾克敦非常欣賞林庚的新詩，認為他的詩雖出之以現代口語，但富於傳統中國詩詞的韻味（possessing many of the characteristic idiosyncras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有王維、蘇軾之

²¹ 同註¹⁹，頁135。

²² 艾克敦的原文是：“Pien’s style was distinguished by extreme directness, a natural rhythm, and a very effective use of the spoken idiom.” *Memoirs of an Aesthete*, pp. 336-337.

²³ *Modern Chinese Poetry*, p. 19. 魏爾崙句出自〈詩藝〉（“Art poétique”）一詩，見 Paul Verlaine, *Selected Poems* [French-English bilingual version]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trans. C. F. MacIntyre, pp. 181-182；莫渝中譯此句作：「是色調變化，不是色彩！」見莫渝譯：《魏爾崙抒情詩一百首》（台北：桂冠出版社，1995年），頁174-177。

風。²⁴《中國現代詩選》選入 15 人 96 首詩，林庚之詩入選最多，共 19 首，佔總數差不多兩成。艾克敦這個取向，其實可歸因於兩個基本因素：一是他抱持艾略特式的「傳統觀」，以為有成就的詩人必與傳統互動，既取資於傳統，又創新以豐富傳統。中國新詩除了承受西方的影響以外，還得活化傳統故舊，以建立現代的風格；²⁵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判定他對中國傳統的把握，其實在於其中「抒情精神」的體會。

張錯在評論艾克敦的選本時，特別點明當中「強烈的抒情偏向」（a strong lyrical bend），「特別見於他對卞之琳、何其芳、林庚、徐志摩等人詩〔的選錄〕」。²⁶張錯指出當時詩壇另有一個回應社會紛亂以及日本侵迫的寫實主義詩潮，但這個選本並沒有顯示出來。如果我們再參考艾克敦及陳世驥合撰的詩人小傳，以及本書附載的兩篇文章，這個選集的「抒情精神」偏向會更為彰顯。兩篇附載分別由廢名和林庚所撰。廢名的〈論現代詩對話錄〉主要從「詩感」（poetic feeling）去理解中國新舊詩的基因及其變化；林庚的〈論詩〉也認為新詩是以新方法來表達「新的感受與情懷」（new sensations and emotions）；換句話說，詩如何「言志」或者「緣情而綺靡」，以薪傳中國詩的精神，仍是他們的關懷所在。²⁷艾克敦在一本以作品為中心的選本，特別劃出篇幅以載入兩篇從抒情傳統與現代之關係去理解新詩的論文，可見其重心的偏向。

當然，艾克敦對中國文學的理解，不無「西方本位」的嫌疑；於他而言，中國文

²⁴ *Modern Chinese Poetry*, pp. 21; 28-30. 據艾克敦在選集〈導言〉中交代，陳世驥當時似乎不太欣賞林庚的詩作，而艾克敦則有所堅持；他更以送交哈莉特·蒙羅的眾多譯作中，林庚詩被選入《詩》刊最多，證明自己實具慧眼。陳、林二人，分別出身北大和清華，同活躍於當時的文會詩壇。陳世驥晚年接受訪問，談到《離騷》時說：「我同意我的舊同學林庚的說法」，見〈斷竹·續竹·飛土·逐穴〉，頁 28。有關林庚的「抒情傳統」文學史觀和詩歌創作的討論，見陳國球〈「文化匱乏」與「詩性書寫」——林庚：《中國文學史》探索〉以及〈思接千載 視通萬里——論林庚詩的馳想〉，收入《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07-147，148-176。

²⁵ *Modern Chinese Poetry*, p. 31; “The Creative Spiri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p. 387.

²⁶ Dominic Cheung,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Anthologies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Eugene Eoyang and Lin Yao-fu e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12-213.

²⁷ Feng Fei-ming, “On Modern Poetry: A Dialogue,” *Modern Chinese Poetry*, pp. 33-45; Lin Keng, “On Poetry,” *Modern Chinese Poetry*, pp. 166-170.

化形象鮮明處，其光源往往是對西方文化得失的思考。然而，他把這種思考角度帶給對世界充滿好奇的陳世驥，卻足以催化這位年輕批評家的文學觀，於現代與傳統的關係作出反思。日後陳世驥對傳統文學的研究，對西方現代文學批評觀念的應用，都有可能與這段和艾克敦切磋琢磨的經驗有關。事實上陳世驥移居美國以後來的一些學術工作，如陸機《文賦》的英譯，仍然得到艾克敦的支援；二人在美國重聚時，更再次合作翻譯中國文學作品，完成英譯《桃花扇》的初稿。²⁸因此，艾克敦和陳世驥的文學因緣，就不僅限於兩三年短暫的大學師生間的學業授受；而陳世驥在學術上發展定位，亦可以循著這些痕跡而得尋見。

陳世驥早期文學思想所承受的影響，除了最親近的艾克敦以外，當然還有得自其他師友交遊，例如上文提到的「讀詩會」和相關活動。當時主其事的朱光潛也是北京大學的老師，1933年開始在外文系開設「西方名著選讀」和「歐洲文學批評史」等課。他還到中文系授課，講課的內容就是尚未出版的《詩論》初稿。²⁹陳世驥應該選過他的課，參加了他課外主持的文學活動。因此，朱光潛及其同群在三四十年代發表的論文，其鼓動的學術風氣，應該會對出國前的陳世驥有所薰染。即使陳世驥出國後，他還繼續與朱光潛聯絡。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第3卷第1期，就刊登了陳世驥的〈法國唯在主義運動的哲學背景〉；陳世驥在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上發表《文賦》英譯，當中也提到朱光潛和他通信，為他提供《文賦》版本的資訊。³⁰夏志清〈悼念陳世驥〉一文提到：

²⁸ *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 pp. 264-265; Cyril Birch, "Harold Acton as a Translator From the Chinese," in Chaney and Ritchie, eds., Oxford, *China and Italy*, pp. 43-44; Chen Shih-Hsiang,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 No. 11, Peiping: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48), p. 44. 有關陳世驥赴美後與艾克敦的文學交往，本文下一節再有討論。

²⁹ 參考〈詩論·抗戰版序〉，《朱光潛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993年），第3卷，頁4；又參錢念孫：《朱光潛·出世的精神與入世的事業》（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頁254；季劍青：《大學視野中的新文學》，頁28。

³⁰ 〈法國唯在主義運動的哲學背景〉（作者題作陳石湘），《文學雜誌》，第3卷第1期（1948年6月），頁17-27；*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p. 25.

世驤同朱光潛在治學上有基本相似的地方：即是他們對美學、對帶哲學意味的文藝批評、文藝理論特感興趣。^{③①}

夏志清對朱光潛和陳世驤的師生關係似乎並不太了解，但他對二人在學術路徑相近的判斷卻是準確的。朱光潛和當時一群對西學有認識的學院中人，對中國文學和文化傳統都有重新體認的熱誠，希望從更寬的視野觀照世界，透過中西文化的同異反思當前的路向，於是開展了不離「現代」關懷的「傳統」研究。我們略為檢索朱光潛在這個時期的著作，可以見到不少從這種思考出發的文章，如〈中西詩在情趣上的比較〉（1934）、〈長篇詩在中國何以不發達？〉（1934）、〈詩的隱與顯——關於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1934）、〈從「距離說」辯護中國藝術〉（1935）、〈從生理觀點論詩的『氣勢』和『神韻』〉（1935）、〈從研究歌謠後我對於詩的形式問題意見的變遷〉（1936）、〈中國詩何以走上『律』的路〉（1936）、〈樂的精神與禮的精神〉（1942）、〈詩的普遍性與歷史的連續性〉（1948）、〈詩的意象與情趣〉（1948）、〈朱佩弦先生的《詩言志辨》〉（1948）……^{③②}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研究朱光潛在二、三十年代的學術路向，指出朱光潛身在一座向傳統傾斜的塔往外望，與當時的澎湃左翼思潮方向迥異；但杜博妮也提醒我們朱光潛不是一位「頑固的保守主義者」（arch-conservative），反而是試圖把中國傳統放在多元的西方理論中來肯定其位置，這立場應屬於「普遍主義者」（universalist）多於「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③③}杜博妮這個精闢的觀察，可以提示我們重思當時的一群「京派學

③① 夏志清：〈悼念陳世驤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傳記文學》第19卷第5期（1971年11月），頁21。

③② 參考溫笑俐編：〈朱光潛著譯目錄〉，《朱光潛美學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5卷，頁554-640。

③③ Bonnie McDougall, "The View from the Leaning Tower: Zhu Guangqian on Aesthetics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wenties and Thirties," in Göran Malmqvist,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Social Context* (Nobel Symposium, No. 32; Stockholm: Nobel House, 1975), pp. 76-122; see also Mario Sabattini, "'Crocianism' in Chu Kuang-chien's Wen-I Hsin-li-hsueh," *East and West* 20.1/2 (1970.3/6): 179-198. 又參考黃繼持：〈朱光潛美學思想的道家色彩與儒家成份〉，《魯迅·陳映真·朱光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51-182。

院批評家」的時代意義，³⁴也是我們理解陳世驥日後學術思想的重要線索之一。

現在回顧陳世驥的學術貢獻，無疑以他的古典文學研究最為重要。但他剛到美國時，還沒有跟中國現代文壇脫節。他一方面在美國的雜誌以英文發表中國現代詩壇的介紹，或者英譯卞之琳和艾青等的新作；³⁵另一方面還有文稿在中國的刊物發表，例如在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發表〈法國唯在主運動的哲學背景〉，在一份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新辦的周刊《新路》發表〈美國文藝的後顧與前瞻〉。³⁶楊牧在整理陳世驥文稿時曾說「〈唯在主義〉一文可能是中國最早談論存在主義的著作」，³⁷雖然不完全準確，但這篇文章的確是四十年代中國文學界引介存在主義的小浪潮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³⁸陳世驥此文雖似是客觀介紹一種新興的哲學思潮，但細看文中有不少重點都預示了他日後的學術著作的一些思考方向。例如他因沙特的「質性先於存在」之說，解釋「質性」（essence，現今通譯「本質」）和「存在」（existence）的關係，說明當中「個人存在的自覺」的意義，正是他後來討論「詩」字源起，以至中國文學的「文化質性」的基礎原則；又如文中對「時間」與「永恆」的關注，也是他晚年力作〈論時：屈賦發微〉的出發點之一。

³⁴ 參考白春超：〈京派的文化選擇：向傳統傾斜〉，《河南大學學報》，第46卷第3期（2006年5月），頁88-92，文中舉出梁宗岱、朱光潛、廢名、沈從文、李長之等作為考察對象；又劉淑玲曾指出當京派作家別有一種「化古」又「化歐」的風格，見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河北學刊》，第24卷第3期（2004年5月），頁132。

³⁵ 相關的文章有：“A Poet in Our War Time,” *Asia* (New York) 42 (1942.8): 479-481; “Sun,” *New Republic* 111 (1944.10.30): 566; “Poems of the Border Region,” *Asia* (New York) 45.7 (1945.7): 338.

³⁶ 〈美國文藝的後顧與前瞻〉，《新路》，第2卷（1948年），頁17-20；按《新路》周刊由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出版，其文藝欄的編輯是蕭乾；參考謝泳《儲安平與〈觀察〉》（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114-123。

³⁷ 楊牧：〈編輯報告〉，《陳世驥文存》（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頁268；又參楊牧〈柏克萊——懷念陳世驥先生〉，《傳統的與現代的》（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年），頁230。

³⁸ 參考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第一章〈存在主義在現代中國：傳播與接受〉，頁50-88。

三、《文賦》英譯的意義

陳世驥到了加州柏克萊大學以後，以陸機《文賦》之英譯正式開展了他的古典文學研究生涯。³⁹翻譯的成果和相關論述發表在 1948 年出版的《北京大學五十周紀念論文集》（*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這一套大型紀念論文集的作者陣容非常鼎盛，除了當時校內的教授以外，還有與北大相關的學者；當中包括燕卜蘇（William Empson, 1906-1984）、房兆楹、孟森、陸侃如、賀麟、魏建功、容肇祖、瞿同祖、朱光潛、錢學熙、袁可嘉、夏濟安等。陳世驥之作共 71 頁；大概因篇幅較大，所以自成一冊（第 11 冊）；其題目是《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封面上還有幾行說明：

本篇研究陸機《文賦》與其生平、與中世紀中國歷史，以至與現代批評觀念的關係，並以詩體翻譯全文。⁴⁰

文章分三部分：一、〈陸機生平與《文賦》之撰定時間考〉（*Lu Chi's Life and the Correct Date of his "Essay on Literature"*）；二、〈談譯文中部分概念和用語〉（*Discussion of Some Idea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Translation*）；三、〈《文賦》英譯〉（*An English Version of the "Essay on Literature"*）。這個可能是《文賦》最早之英譯本，雖然由中國重要學術中心北京大學隆而重之地籌劃出版，但面世時適值中國政局劇變，其流通量似乎非常有限。有鑑於此，陳世驥於 1953 年把譯文單行出版，但刪去第一、二部分的研究論述；譯文前有張充和手書《文賦》原文，後加上〈附記〉（*Supplementary Note*）一篇，

³⁹ 與英譯《文賦》出版的同一年，他與柏克萊的同事，漢學家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 1903-1972）合著《絕句廿五首·附詞彙練習》（*Twenty-five Chinese Quatrains, with Vocabulary Exercis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原書未見，但從書名看來，應是教科書一類著作。

⁴⁰ "Being a study of Lu Chi's 'Essay on Literature', in relation to his life, his period in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and some modern critical ideas;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text in verse."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cover page.

交代他和逯欽立就陸機撰寫《文賦》時間的討論。^{④①}書前新撰〈導言〉(Introduction)，從比較文學及文學史的角度申論陸機和《文賦》的意義；書名逕題《陸機文賦》(*Essay on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④②}相對來說，1948 年的譯本比 1953 年本有更多陳世驥對《文賦》的解說，故以為下文討論的主要根據；然而 1953 年本的〈導言〉亦深刻精要，將參酌採用。

《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以相當的篇幅論述陸機的生平，並考訂其創作《文賦》的年份。學界對陸機撰《文賦》的年代，以前多據杜甫《醉歌行別從侄勸落第歸》「陸機二十作文賦」一語，以為是他是年輕時期的作品。陳世驥則認定是永康元年（公元 300 年）。他的判斷其實與逯欽立同於 1948 年發表的〈《文賦》撰出年代考〉非常接近，主要證據同是陸雲〈與兄平原書〉「兄頓作爾多文」之說，以為「多文」包括《文賦》和《感逝賦》；後者可能就是見諸《文選》的《歎逝賦》，其序有「余年方四十」之句。陳世驥因此以為《文賦》和《感逝賦》同作於陸機四十歲，也就是永康元年；逯欽立則以為陸雲的信撰於永寧二年（302 年），《文賦》應是永寧元年歲暮之作品。^{④③}二人對這個問題有往返四封信討論，補充了論據，但結論沒有改變。^{④④}

我們在此不必追問誰人的考證比較詳實可靠，^{④⑤}值得一提的是兩人的考證過程所

④① 逯欽立後來把兩人往返討論的信件發表，見陳世驥、逯欽立：〈關於文賦疑年的四封討論信〉，《民主評論》，第 9 卷第 13 期（1960 年 2 月），頁 16-18。

④② *Essay on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 (Portland, Maine: The Anthoensen Press, 1953). 據書後說明，這個版本也只印 400 本；後來白之編《中國文學作品選》抽選了陳世驥英譯之正文，是為陳譯流通最廣的版本，見 Cyril Birch, ed.,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p. 204-214. 此外楊牧把陳世驥的英譯和徐復觀：〈陸機文賦疏釋初稿〉合為一集，再加其他注疏與個人闡釋發明，撰寫《陸機文賦校釋》（台北：洪範出版社，1985 年），於是陳世驥的譯文亦在華文學界流通。

④③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pp. 11-20; 逯欽立：〈《文賦》撰出年代考〉，原刊《學原》（1948 年），收入逯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421-434。

④④ 〈關於文賦疑年的四封討論信〉，頁 16-18。

④⑤ 學界對有關問題還有不同的說法，例如王夢鷗以為《文賦》之作約在元康八年（298 年）以前，見王夢鷗：〈陸機文賦所代表的文學觀念〉，《古典文學論探索》（台北：正中書局，1984 年），頁 101-115；近期又有胡耀震的元康元年（291 年）說，見〈文賦撰年疑案推斷〉，《天津師範大學學

顯示出來的學術風格。逯欽立是非常嚴謹的安排資料，用平實的語言進行乾嘉考據式的推理。陳世驥則筆端常帶感情，解讀文獻時表現出敏銳的文學觸覺。例如他會從感情邏輯看陸機《吊魏武帝文》，哀憫「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以為兩年後陸機寫《文賦》，正是這個感慨的自然發展：以詩賦文章為人心之大用（the best of the mind），以超越生死界限而至不朽（immortality）。他非常在意把《文賦》之撰年考定於永康元年。這一年趙王倫誅賈謐，陸機因參預其事而獲賜爵關中侯；然而，曾賞識陸機兄弟而力加薦引的張華卻因此事而被殺。政治世情波譎雲詭，陸機身不由己，三年後就因身陷八王亂事而喪命。陳世驥指出陸機在永康元年突然爆發出強大的創作力，正是一個苦悶的靈魂在漆黑昏暗中尋覓光源的表現，所以陸雲信上說：「兄頓作爾多文，而新奇乃爾，真令人怖！」陳世驥又以為「多文」中的《羽扇賦》和《漏刻賦》讓人聯想到人類如何面對「命運無常」與「時間」，《感逝賦》、《詠德賦》和《述思賦》是追思張華，感懷時世之作，尤其《感逝賦》所說：「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然後弭節安懷，妙思天造，精浮神淪，忽在世表」，正是這深受折騰的心靈在昏暗歲月中掙扎和求索的表現；而《文賦》就是他的求索所得的正式宣告：以文學作為對抗黑暗之光！

陳世驥的考訂，其實是一位敏感的批評家對一顆文學心靈的追蹤，是超越時空阻隔的知音感會。他和逯欽立討論雙方的論據後總結說：

任何考據，多難免臆測成分，惟以最近於良心，合於物證，故堅持之。⁴⁶

所謂「臆測」，所謂「良心」，最難把握；無論怎樣嚴謹的考據，都需要敢於冒險的

報》第5期（2003年），頁57-61。張少康在檢討過不同的說法以後說：「目前尚無材料可以確切地說明《文賦》的創作年代，不能輕下結論。好在這個問題對理解《文賦》的內容並沒有甚麼影響。」見張少康：《文賦集釋》（台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3-4。然而，創作年份的確立對陳世驥來說，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⁴⁶ 陳世驥、逯欽立：〈關於文賦疑年的四封討論信〉，《民主評論》第9卷第13期（1960年2月），頁17。

想像力來推動。除了文獻功夫之外，陳世驥所倚仗的就那種心靈追跡的能力。同時此一考訂也顯示陳世驥對「詩」——或者說「創造性文學」（creative literature）——之為用的理解。我們回看他在 1942 年寫的〈戰火歲月一詩人〉（A Poet in Our War Time）一文，也會見到同一的信念的宣示。

這篇文章的論述對象再是他的好朋友卞之琳，大概是陳世驥作為現代詩評論家的最後演出。此後他的學術主要領域就是中國古典文學，對五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當代文學雖有論述，但性質已然不同。⁴⁷篇中主要討論卞之琳於 1940 年在香港出版的《慰勞信集》。⁴⁸詩集各篇是應當時「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的號召而寫的「慰勞信」，功用是宣傳抗戰，這與卞之琳以個人私我作基調的前期詩歌大不相同。對這些作品最理所當然的評論就是指出卞之琳的思想轉向，走向人民大眾，宣揚愛國精神。⁴⁹可是，批評家陳世驥卻從詩人特有的魅力和感應力（inborn poetic charm and sensitivity）去閱讀卞之琳這一組寫於滄溟鼎沸的戰時詩歌；他眼中的卞之琳有如：

浮泛於崩石的浪濤間的一隻白鴿，它最能感應到其中的怒潮，但卻能翩然地舒展如雪的雙翼，溷濁不沾。

⁴⁷ 陳世驥在加州柏克萊大學主持一個「中國研究中心」，撰寫了好幾篇研究當代文學的文章：“Multiplicity in Uniformity: Poetry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hina Quarterly* 3 (1960): 1-15; “Metaphor and the Conscious in Chinese Poetry under Communism,” *China Quarterly* 13 (1963): 39-59; “Artificial ‘Flowers’ during a Natural ‘Thaw’,” in Donald W. Treadgold, *Soviet and China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p. 220-254;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der Communism,” in Wu Yuan-li ed., *China: A Handbook* (Newton Abbot: David and Charles, 1973), pp. 705-735. 但其觀察的角度近似情資研究，和過去的文學批評態度不同。

⁴⁸ 陳世驥在文中說是昆明出版。卞之琳對此有所解釋：「《慰勞信集》剛寫成，恰逢友人來游峨嵋山，一讀就要去給他在香港新辦的明日社。1940 年出版這個單行本的明日社當時是在香港，卻掛名在昆明。」卞之琳：〈十年詩草·重印弁言〉，江弱水、青喬編：《卞之琳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5。

⁴⁹ 參考杜運燮：〈捧出意義連帶著感情——淺議卞詩道路上的轉折點〉，袁可嘉、杜運燮、巫寧坤主編：《卞之琳與詩藝術》（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頁 86-91。

但他仍然臨顧人間，清楚聽到自己的脈動。⁵⁰因為詩的力量，可以戰勝黑暗，可以感應滄桑；能不為物質世界所限囿，卻又不離人世；就如《文賦》所宣示的一樣。

因此，在陳世驥眼中，莊嚴深刻之作如《文賦》，只會是陸機這位深陷苦痛中的詩人方能寫出；其中對「文學創作的體悟」，是「在超離昏亂世局的昇華時刻」才得達致（the contemplation of creation at a sublime hour of detachment from the world's chaos and gloom）。⁵¹

陳世驥在其批評和學術的著作中，以特有的敏感觸覺去體貼或遠或近的詩心，彰顯文學的創造力量，其實也有藉此抒發己懷之意。他的北京大學老師艾克敦在其後的回憶錄中，對陳世驥英譯《文賦》時期的境況有相當深入的記述。艾克敦看到從前的學生已成大器，更是一位已然啟悟的人文主義者（an enlightened humanist）。他又察覺到這時的陳世驥其實猶如身陷亂世的陸機。當世人紛紛逃遁於道教佛門時，陸機仍然堅守聖人之道，成為「最後的儒者」，⁵²好比陳世驥在堅持他的人文主義信念。艾克敦更認為陳世驥因為與陸機同樣認為「文學」可以是「對抗黑暗的光」，才有信心面對「回去中國」還是「留在加州」的猶疑。⁵³艾克敦曾目睹當時頗有一些來勸歸的說客，在這位「唯美者」眼中，回到中國比不上留在柏克萊，因為此間可以繼續薪傳中國文化的火光。因此，翻譯《文賦》可謂別具深義，艾克敦甚至認為為陳世驥之以現代英語去捕捉中世紀中國書寫的思想與意象，其實就是一次艱辛的歷險（exacting venture）。⁵⁴斯時兩人又合作英譯《桃花扇》，在陳世驥心內，黍離麥秀之感一定非常強烈。⁵⁵再參看陳世驥和遂欽立隔洋討論《文賦》繫年的第二封信所說：

⁵⁰ “A Poet in Our War Time,” 479-481.

⁵¹ *An Essay on Literature*, “Introduction,” p. xiii.

⁵² *An Essay on Literature*, pp. x-xi

⁵³ 除了政治、文化和人生信念以外，陳世驥對時局與去留問題的思考，也可能有個人情感問題牽扯其中。1947年，與陳世驥結婚只有幾年的姚錦新女士毅然離美回國，到清華大學就教職。陳世驥當時心情之昏暗無光，可以想見；參夏志清〈悼念陳世驥〉，頁19；*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 p. 265.

⁵⁴ *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 p. 263-264.

⁵⁵ *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 p. 265；兩人的譯稿及複本一直留在各自的抽屜，直到陳世驥身後，才由白之整理出版；見Cyril Birch, “Acton as a Translator from the Chinese,” p. 43. 對此，我們可以有這

且國內大杌隍，而兄能靜心澄思，鉤尋典籍，益見修養之深，不勝佩慰。⁵⁶

這封信寫於 1948 年 12 月 27 日，當時遂欽立尚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時局變化當然勾連思緒，陳世驥這幾句話應是他自己內心世界的反映。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陳世驥在古典文學研究的首航，我們需要究問的就不應停留在「純學術」的問題，例如：他的《文賦》繫年是否確鑿不移？他的譯本是否符合「信、達、雅」的要求？反而，我們可以留心他為何對「文學」的「秩序」那麼重視？為何他會把「情」翻成“ordeal”（試煉）？

以後者而言，陳世驥特別解釋他譯「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每自屬文，尤見其情」的後兩句作“‘When I compose my own works, I am more keenly aware of the ordeal.’”他指出「情」是一個具備雙重意義的詞：同時指向「主觀經驗」及「客觀境況」，所以一般分別譯作“feeling”或者“situation”；⁵⁷而《文賦》此處討論的是作家寫作過程，譯作「試煉」可同時兼指作者嘗試處理的境況，以及作家感應情緒之激越。⁵⁸這是陳世驥嘗試以學理來解釋這個特殊的譯法。但若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去理解陳世驥之情，其實作為批評家或者隔世譯者如他，要貼近原作者的心靈，還不是要想盡辦法「得其用心」、「見其情」？正艾克敦說，這是一種「艱辛的歷險」，也是一種「試煉」。沿用陳世驥理解陸機的邏輯，我們如能體會陳世驥的心靈，就可以明白譯成「試煉」的真意。

至於文學中「秩序」之義，更是陳世驥再三致意之處。《文賦》中有「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兩句，從文意看來，不外指謀篇佈局，如徐復觀所說：

寫作首須謀篇佈局。「選義按部」兩句，皆謀篇佈局之事，而以「選義按部」

樣的詮解：二人翻譯《桃花扇》是心靈安頓的儀式多於學術工作，是否出版不一定重要。

⁵⁶ 同註⁴⁶，頁 18。

⁵⁷ Stephen Owen 則譯作“‘And whenever I myself compose a literary piece, I perceive full well their state of ‘mind’ or ‘the situatio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p. 80.

⁵⁸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p. 23.

句為主；蓋辭附於義，辭之班次乃由義決定。⁵⁹

現代有學者對「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的比喻性感到興趣，以為這是政治官場的比喻，重點是「考」和「選」，而「選義」顯然比「考辭」重要。⁶⁰陳世驥卻對「按部就班」比較感興趣，因為橫互於他胸中的是「秩序」的重要性。他譯「班」為“order”，然後引用柯立律治（S.T. Coleridge, 1772-1834）在《桌邊文談》（*Table Talk*）的話作解釋：

詩＝以最佳的秩序佈置最佳的字詞（Poetry=the best words in their best order）。⁶¹

這個定義本身並非特別高深，但陳世驥再進而追問「最佳秩序」從何而來？以誰的觀點來判定？所以他再從柯立律治的《文學傳記》第十八章（*Biographia Literaria*, Chapter XVIII）找答案。柯立律治在此非常熱心地細論「秩序」的意義，指出這「秩序」來自詩人的內在力量（inner power）；詩人必須有此能力「去措置其內心的經驗」（to order his inner experience）。陳世驥認為陸機對詩的理解和柯立律治一樣，所以「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的思考不僅止於修辭技巧的經營，而是源於內心世界的一種「秩序」的追求，源於所處世界一切崩壞和混亂所激發的熱忱。文學的理想「秩序」，包含了對新生的盼望，對光明的不斷尋索。⁶²

四、結 語

以上對陳世驥早期文學經驗的追蹤，大概可以見到二十世紀中前期一位年輕敏慧

⁵⁹ 徐復觀：〈陸機文賦疏釋〉，《中國文學精神》（上海：上海書店，2004年），頁221。

⁶⁰ 參 Stephen Ow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p. 104; 朱曉海：〈文賦通釋〉，《清華學報》，新33卷第2期（2003年12月），頁323-324。

⁶¹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p. 30. 此外，陳世驥在翻譯「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時，也參照柯立律治之說譯作：“To the all-pervasive law of word order and literary discipline / I have devoutly dedicated myself.” Ibid. p. 66.

⁶²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p. 20, 31.

的批評家如何養成他的文學信念。從三十年代中的一篇卞之琳和臧克家的作品評論看來，陳世驥表現出深刻的鑒賞能力，對詩歌語言非常敏感。他想著「詩人操著一種另外的語言，和平常語言不同」，而這語言「可以代表我們的靈魂上的感覺與情緒」。他關心的就是內心世界（「我們的靈魂」）與外在世界的關連，「文學」（以「另外一種語言」構成）在這兩個世界之間的作用。「文學」雖說是「理想」之物，但這理想卻是「內心」「現世」之間最有效的中介。再參詳陳世驥的文學訓練，發覺到他的老師如艾克敦對「文學」的理想的見解，頗有向中國抒情傳統靠近的表現；至於當時對陳世驥有直接影響的京派學人如朱光潛等，亦在思考中國文學傳統可以為現代文學提供甚麼資源，國人應如何從更寬闊的視野理解傳統。這些論述對日後移居美國，在西方的東亞學系中從事教研工作的陳世驥，應該有啟發的作用。

陳世驥在美國再論卞之琳。時當抗戰歲月，卞詩主題亦毫不隱晦。在這個語境底下我們可以見到陳世驥的論述並不是脫離現實的玄想。他只是關心文學如何感應現實，呼應現實而又不為現實羈絆；甚而以其所具力量豐富現實。這種力量就是他的《文賦》英譯和詮釋所揭示的以文學為「對抗黑暗之光」。上文交代了陳世驥如何從感情邏輯去追蹤陸機寫作《文賦》的心情，再從《文賦》探視這一代天才的靈魂深處，體認其文心。事實上，從陳世驥的詮解過程我們得悉，他之書寫陸機和《文賦》，實在也寄寓了他的鬱結和探求對抗黑暗之光的盼望。

在此以後，陳世驥以古典文學為研究重心，先是 1951 年〈探求中國文學批評的起源〉（“In Search of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接著《文賦》英譯開出的思路，從「詩」字意義，到「言志」、「緣情」到「情志」的觀念變化，去說明中國文學批評的思想方式。其他重要論文如 1961 年〈中國詩字之原始觀念試論〉，1966 年的〈早期中國的詩觀念〉（“Early Chinese Concepts of Poetry”），1968 年的〈《八陣圖》圖論〉（“To Circumvent ‘The Design of Eightfold Array’”），1969 年的〈《詩經》在中國文學史與詩學的文類意義〉（*The Shih-ching: Its Generic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Poetics*），與在他離世後刊布的〈論時：屈賦發微〉（“The Genesis

of Poetic Time: The Greatness of Ch'ü Yuan”)等，⁶³其思慮基點亦多牽及詩人心靈世界、內在力量，以至秩序的意義等，可說是陳世驥文學觀的一貫發展。至於他的拱鼎論文〈中國的抒情傳統〉中所說：

以字的音樂做組織和內心自白做意旨是抒情詩的兩大要素。中國抒情道統的發源，《楚辭》和《詩經》把那兩大要素結合起來。⁶⁴

兩大要素，也就是陳世驥一向關注的「秩序」的布置與「內在經驗」的宣示，出諸同向的思考。當然，陳世驥後期的論述絕對比早前的意見深刻而精微；其間浸漸發展之跡，還有待另文細論。

主要參考及引用文獻

一、現代中西論著專書

卞之琳著，江弱水、青喬編：《卞之琳文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朱光潛：《朱光潛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993年。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

邵洵美：《洵美文存》，瀋陽：遼陽教育出版社，2006年。

張少康：《文賦集釋》，台北：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

張潔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紀30年代北平「前線詩人」詩歌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

莫渝譯：《魏崙抒情詩一百首》，台北：桂冠出版社，1995年。

陳世驥著，陳子善編：《陳世驥文存》〔簡體字版〕，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陳世驥著，楊牧編：《陳世驥文存》，台北：志文出版社，1972年

⁶³ 參見 “Bibliography of Chen Shih-hsiang, 1912-1971, Part I: Writings in English,” pp. 150-152; “Bibliography of Chen Shih-hsiang, 1912-1971, Part II: Writings in Chinese,” pp. 153-154.

⁶⁴ 〈中國的抒情傳統〉，《陳世驥文存》（同註⁶³），頁32-33。

- 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楊牧：《陸機文賦校釋》，台北：洪範出版社，1985 年。
- 楊牧：《傳統的與現代的》，台北：志文出版社，1964 年。
- 解志熙：《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
- 錢念孫：《朱光潛·出世的精神與入世的事業》，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年。
- 錢鍾書：《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
- 謝泳：《儲安平與〈觀察〉》，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 年。
- Acton, Harold, and Chen Shih-Hsiang. *Modern Chinese Poetry* (London: Duckworth, 1936).
- Acton, Harold. *Memoirs of an Aesthete* (London: Methuen, 1948).
- Acton, Harold. *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 (London: Methuen, 1970).
- Birch, Cyril. ed.,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 Chany, Edward, and Neil Ritchie eds. *Oxford, China, and Italy: Writings in Honour of Sir Harold Acto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4).
- Chen Shih-Hsiang. *Essay on Literature: 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 (Portland, Maine: The Anthoensen Press, 1953).
- Chen Shih-Hsiang. *Literature as Light Against Darkness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Semi-Centennial Papers, No. 11, Peiping: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48).*
- Owen, Stephen. *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 Verlaine, Paul. *Selected Poems* (Berkeley,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8). [French-English bilingual version, trans. C. F. MacIntyre].

二、單篇論文

- 王夢鷗：〈陸機文賦所代表的文學觀念〉，《古典文學論探索》，台北：正中書局，1984 年，頁 101-115。
- 史誠之：〈桃李成蹊南山皓——悼陳世驥教授〉，《明報月刊》，68 期，1971 年 8

月，頁 14-22。

白春超：〈京派的文化選擇：向傳統傾斜〉，《河南大學學報》，第 46 卷第 3 期，2006 年 5 月，頁 88-92。

杜運燮：〈捧出意義連帶著感情——淺議卞詩道路上的轉折點〉，載袁可嘉、杜運燮、巫寧坤主編《卞之琳與詩藝術》，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頁 86-91。

沈從文：〈新詩的舊賬——並介紹詩刊〉，《大公報·文藝》，1935 年 11 月 10 日。

胡耀震：〈文賦撰年疑案推斷〉，《天津師範大學學報》，2003 年第 5 期，頁 57-61。

夏志清：〈悼念陳世驥並試論其治學之成就〉，《傳記文學》，第 19 卷第 5 期，1971 年 11 月，頁 16-23。

楊牧：〈柏克萊——懷念陳世驥先生〉，《傳統的與現代的》，台北：志文出版社，1974 年，頁 218-232。

商禽：〈六松山莊訪陳世驥教授問中國文學〉，張默、管管主編《從真摯出發》，台中：普天出版社，1971 年，頁 1-18。

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臺灣文學研究集刊》創刊號，2006 年 2 月，頁 1-33。

陳子善：〈本書說明〉，《陳世驥文存》〔簡體字版〕，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卷前。

陳世驥、遂欽立：〈關於文賦疑年的四封討論信〉，《民主評論》，第 9 卷第 13 期，1960 年 2 月，頁 16-18。

陳世驥：〈中國詩之分析與鑒賞示例〉，《文學雜誌》，第 4 卷第 4 期，1958 年 6 月，頁 4-16。

陳世驥：〈今日的詩〉，《新詩》，第 2 卷第 2 期，1937 年 5 月，頁 144-145。

陳世驥：〈北大外景速寫〉，載《北京大學卅五周年紀念刊》，北京大學 1935 年 12 月版，收入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529-532。

陳世驥：〈美國文藝的後顧與前瞻〉，《新路》，第 2 卷，1948 年，頁 17-20。

陳世驥：〈對於詩刊的意見〉，《大公報·文藝》，第 55 期，1935 年 12 月 6 日。

- 陳石湘〔陳世驥〕：〈法國唯在主運動的哲學背景〉，《文學雜誌》，第3卷第1期，1948年6月，頁17-27。
- 遂欽立：〈《文賦》撰出年代考〉，原刊《學原》（1948年），收入遂欽立《漢魏六朝文學論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421-434。
- 楊聯陞：〈追懷石湘——陳世驥選集序〉，《傳記文學》，第19卷第5期，1971年11月，頁18-19。
- 溫笑例編：〈朱光潛著譯目錄〉，載《朱光潛美學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5卷，頁554-640。
- 劉淑玲：〈《大公報》與中國現代文學〉，《河北學刊》，第24卷第3期，2004年5月，頁129-135。
- 謝朝樞：〈斷竹·續竹·飛土·逐穴——陳世驥教授談：詩經·海外·楚辭·台港文學〉，《明報月刊》，第68期，1971年8月，頁23-30。
- Acton, Harold. "The Creative Spirit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ien Hsia Monthly* 1.4 (1935.11): 374-387.
- Birch, Cyril. "Obituary: Shih-Hsiang Chen, April 23rd, 1912-May 23rd, 1971."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1.4 (October-December, 1971): 570-571.
- Chen Shih-Hsiang. "A Poet in Our War Time," *Asia* (New York) 42.7 (1945.8): 479-481; "A Poet in Our War Time," *Asia* (New York) 42 (1942.8): pp. 479-481.
- Chen Shih-Hsiang. "Artificial 'Flowers' during a Natural 'Thaw'." In Donald W. Treadgold, *Soviet and China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pp. 220-254.
- Chen Shih-Hsiang.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der Communism," In Wu Yuan-li ed., *China: A Handbook* (Newton Abbot: David and Charles, 1973), pp. 705-735.
- Chen Shih-Hsiang. "Metaphor and the Conscious in Chinese Poetry under Communism." *China Quarterly* 13 (1963): 39-59.
- Chen Shih-Hsiang. "Multiplicity in Uniformity: Poetry an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hina Quarterly* 3 (1960): 1-15.

- Chen Shih-Hsiang. "Poems of the Border Region." *Asia* (New York) 45.7 (1945.7): 338.
- Chen Shih-Hsiang. "Sun." *New Republic* 111 (1944.10.30): 566.
- Cheung, Dominic.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Anthologies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Translation." In Eugene Eoyang and Lin Yao-fu ed., *Translating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207-220.
- Cohen, Alvin P. "Bibliography of Chen Shih-hsiang, 1912-1971, Part I: Writings in English."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1 (Jan., 1981): 150-152.
- Feng Fei-ming. "On Modern Poetry: A Dialogue." In Acton and Chen, *Modern Chinese Poetry*, pp. 33-45.
- Lin Keng. "On Poetry," In Acton and Chen, *Modern Chinese Poetry*, pp. 166-170.
- McDougall, Bonnie. "The View from the Leaning Tower: Zhu Guangqian on Aesthetics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wenties and Thirties." In Göran Malmqvist,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Social Context* (Nobel Symposium, No. 32; Stockholm: Nobel House, 1975), pp. 76-122.
- Sabattini, Mario. "'Crocianism' in Chu Kuang-chien's *Wen-I Hsin-li-hsueh*." *East and West* 20.1/2 (1970.3/6): 179-198.
- Wang C. H., and Joseph R. Allen, III. "Bibliography of Chen Shih-hsiang, 1912-1971, Part II: Writings in Chines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1 (Jan., 1981): 153-154.
- Witke, Charles. "Chen Shih-Hsiang: In Memoriam." *Tamkang Review* 2.1 (1971): 1-2.

三、學位論文

- 季劍青：《大學視野中的新文學——1930年代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北京：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7年。

Before “Lyrical Tradition” is Conceptualized —A Study of Chen Shih-hsiang’s Early Literary Criticism

K. K. Leonard Chan

Professor in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We all know that Chen Shih-hsiang’s (1912-1971) article “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is seminal to later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Yet we are not so informed of the context of this salient concep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examine Chen’s early discourses on literature, to look into his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the correlated cultural politics.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formation of Chen’s literary though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

Keywords: lyrical tradition, Chen Shih-hsiang, Harold Acton, Zhu Guangqian, Lu Ji, “Essay on Literature”

